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学部
ACADEMIC DIVISION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经济蓝皮书 春季号

2014年 中国经济前景分析

ANALYSIS ON THE PROSPECT OF CHINA'S
ECONOMY (2014)

主 编/李 扬

副主编/李 平 李雪松 张 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经济蓝皮书春季号

BLUE BOOK OF
CHINA'S ECONOMY (SPRING)



2014 年 中国经济前景分析

ANALYSIS ON THE PROSPECT OF CHINA'S
ECONOMY (2014)

主 编 / 李 扬

副主编 / 李 平 李雪松 张 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4 年中国经济前景分析/李扬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5

(经济蓝皮书春季号)

ISBN 978 - 7 - 5097 - 5861 - 8

I. ①2… II. ①李… III. ①中国经济 - 经济预测 - 研究报告 - 2014 ②中国经济 - 经济发展趋势 - 研究报告 - 2014
IV. ①F123.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7175 号

经济蓝皮书春季号

2014 年中国经济前景分析

主 编 / 李 扬

副 主 编 / 李 平 李雪松 张 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分社 (010) 59367127

责任编辑 / 安 蕾 王凤兰 彭 战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责任校对 / 张成海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6.5

版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字 数 / 340 千字

印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861 - 8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经济增速趋降 应对还须改革

李 扬

一 危机仍未有尽期

2007 年初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在短时期内迅速席卷全球，演变成一场百年不遇的全球灾难。如今，七年初度，我们总的估量是，危机远未逝去，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作出这一论断的根据是，酿成危机的基本因素并没有消失，其中，尤以过度消费、过度福利和过度负债为主要表现的经济发展方式扭曲，以服务业过度发展、产业空心化为主要表现的经济结构扭曲，以过度杠杆化和对实体经济“疏远化”为表现的金融体系“去功能化”，以政府赤字率和债务率长期居高不下为特征的财政危机等导致危机发生的关键因素，基本都未去除。更有甚者，各国在反危机过程中采取的那些超常规刺激政策，在阻止危机恶化的同时，也弱化了危机自身的净化和调整作用，进而为复苏增添了新的障碍。如今，由巨量 QE 导致的货币供应洪水泛滥，以政府债台高筑为主要表现的“财政悬崖”，以市场纪律混乱为表现的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破坏，以及由这些问题引发的社会动荡愈演愈烈等，都成为阻碍危机恢复的新因素。

伴随着发达经济体开始退出量宽，广大新兴经济体的问题开始凸显，这构成危机新阶段的又一大特征。危机以来，一度出现发达



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拉开距离且互不关联的“双速脱钩”现象。然而，正当人们乐观地宣称“这一次不同了”之时，2013年发生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普遍下滑的情形却冰冷地提醒我们，所谓“双速脱钩”，只是危机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现象。新兴经济体在危机最初几年中增长迅速，主要得益于发达经济体数量宽松政策导致大量资本流入这些国家。然而，由于国内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未得到有效调整，一旦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宽退出，一个相反的过程就会出现：大量资本外流，继而导致股市狂泻，汇率急贬，经济增长率下滑。这种状况充分说明：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各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个世界仍然由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主导；至于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则并未根本摆脱储蓄与外汇“双缺口”的钱纳里符咒。

发达经济体自顾不暇，新兴经济体再度深陷传统发展困局，使得当今世界出现了治理真空，这也是危机仍在继续的明证之一。几年来，我们见证了二战后由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主导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一顶顶皇冠落地”，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国际清算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能源署、世界劳工组织等传统全球治理机构，既不能有效应对传统挑战，更无法对日趋复杂的非传统挑战适时应变。然而，危机中产生的新的治理机制，如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虽然一度风光无限，但危局稍缓之后，随即被各种狭隘的国家和地区利益挤压，发展势头不再。与此同时，我们倒是看到了全球多边主义的迅速发展。各方根据专门议题形成网络或者伙伴关系，凭借特定共同利益、价值观及能力形成合作，已经蔚然成风。其未来发展方向，依然难以预测。

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也不例外。从2009年开始，中国经济便已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从经济结构变动看，由于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制造业，当经

济结构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时，中国的总体劳动生产率必然下降，并累及经济增长率下降。从生产要素结构看，在科技进步缓慢的背景下出现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的下降，同样塑造了我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格局。与此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并导致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随着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规模渐趋缩减，与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同时并存的，将是劳动力成本的刚性上升。以上种种导致经济减速的因素，既非周期性，更非政策性，都是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我们如果不愿被动接受，只能依靠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和大力推进创新战略，方能对其发展趋势施以影响。

在结构性减速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出现了若干值得关注的隐忧。其一，尽管 7.5% 左右的增长速度令其他国家艳羡，但 2 ~ 3 个百分点的增速下落，无疑会带来大量复杂且意外的冲击，这些冲击可能需要数年才能消化。因此，如何将增长速度控制在由潜在增长率确定的合理区间，同时促进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将考验我们的智慧和定力。其二，房地产业中潜在的风险不容忽视。当城镇化战略被在城乡一体化的大框架下重新设置，当全国房地产登记系统于 2014 年 6 月开始启动，当中国城市发展的区域化特征日趋明显，并已显出清晰的层次差别和分化趋势之时，中国房地产市场无疑将迎来新的局面。其三，产能过剩严重存在。虽然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国家共有现象，但规模如此之大，覆盖面如此之广，持续时间如此之久，显然为中国独有。我们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消弭产能过剩，否则，未来的发展将缺乏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其四，相比于发达国家的宽货币、低利率、紧信用的组合，中国的金融业呈现的是宽货币、高利率、贷款难、贷款贵的怪异组合，加上金融机构自我服务倾向日趋明显，人们有理由怀疑，乱象丛生的中国的金融业还能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多少正能量。其五，地方政府



债务风险。总体上看，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不存在大问题，但是局部存在隐患，却也不容忽视。尤为重要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城镇化战略转型，房地产市场的调整，都可能压缩地方政府的还债空间，使部分地方政府债务趋于恶化。

全球危机深重到百年不遇的程度，无疑是全球实体经济出了大问题。因此，危机的治本之策，是对行之多年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战略性调整，对高度扭曲的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革。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认真采取的战略。毫无疑问，哪个国家对改革的认识更深刻、策略更完备、决心更大、效果更明显，这个国家就将在未来全球新发展中抢占先机。我们欣慰地看到，在新的全球改革大潮中，中国再次成为最勇敢的弄潮儿。

二 稳增长仍然靠投资

在2014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中国政府为2014年的经济确定了7.5%的增长目标。如今，一个季度已经过去，初步的数据显示，经济下滑的趋势日渐明显，要完成预定增长目标，客观上存在着困难。为防止增长率的下滑突破底线，我们需要制定若干稳定经济的预案。

分析近年来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外需）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其变化轨迹，有助于我们精准寻找实施调控的入手处。

2006年以来，在一系列强刺激政策作用下，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曾有过稳定增长。但是，在2011年达到55.5%的高峰之后，其贡献率一路下滑，两年跌落5个百分点，2013年降至50%。这说明，最终消费作为慢变量，其规模相对稳定，急切间难有作为。再考虑到某些领域的公共消费受到抑制的情形，消费对经

济的拉动作用短期内更难大幅提升，无法成为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主导力量。同期，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率更是急剧下挫。在 2009 年创纪录的 -37.4% 之后，除了 2010 年略升为正，其余三年均呈负值，2013 年贡献率仍为 -4.4%（见图 1）。考虑到 2013 年初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出现较大规模虚假套利贸易，导致外贸数据扭曲的因素，外需（净出口）的贡献或将进一步降低。相比而言，投资的贡献率虽有波动，但却呈稳定增长态势：从 2006 年的 43.6% 提升至 2013 年的 54.4%，7 年内跃增 10 个百分点以上，2013 年，它更是再次超过消费对 GDP 的贡献率。上述图景告诉我们，至少在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主要来自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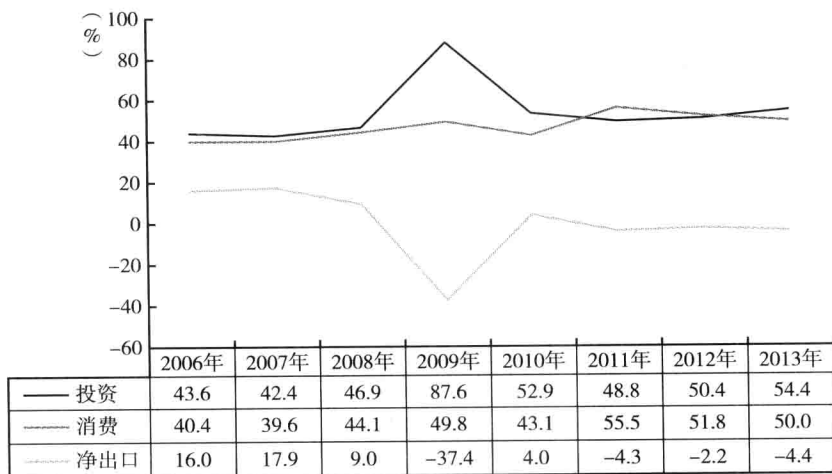


图 1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史同时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依靠投资来主导经济增长，很容易助长唯 GDP 倾向，恶化国民收入分配，忽略环境资源约束，造成生态破坏，并形成产能过剩。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得不依赖增加投资来稳定经济，那么，



能否高度警惕并认真防止那些已经被历史证明的投资弊端，关乎政策的成败。于是，认真研究投什么、谁来投以及怎样投的问题，便成为政策的关键。换言之，沿用传统的工具来从事宏观经济调控的前提，是这种工具自身首先需要深度改革。

三 投什么^{*}

应当看到，经过长达 30 余年高强度的工业化，在传统商业环境下可创造较大利润的工业投资项目已基本被挖掘殆尽；基础设施中的经济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公用事业（电力、管道煤气、电信、供水、环境卫生设施和排污系统、固体废弃物的收集和处理系统），公共工程（大坝、灌渠和道路）以及其他交通部门（铁路、城市交通、海港、水运和机场）等，经过 2009 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横扫，也已没有多少有利可图的空间。因此，要想启动投资引擎，我们必须寻找新的领域，同时，要为这些领域的投资创造必要的商业化环境。

就投资领域而言，有三个领域需要重点关注。

其一，有利于促进消费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领域，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应当认识到，进一步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性领域的投资力度，不仅增加了当期投资，而且对长期拉动消费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一方面，可以降低居民的远期支出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者的“可行能力”和在初次分配中的“议价能力”，改变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有效解决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问题，促进农民工进城定

^{*} 常欣研究员为本文提供了第三、四、五小节的初稿。

居，充分释放城市化对扩大消费需求的促进作用。在加强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的过程中，特别要关注健康服务业这一新兴服务业所蕴涵的巨大需求。该产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在一些发达经济体已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美国健康服务业规模占 GDP 的比例超过 17%，其他 OECD 国家一般也达到 10% 左右。2013 年 10 月，国家出台了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可以预期，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老龄人口不断增多，健康服务业蕴涵着极大的投资潜力和空间。

其二，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更新改造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过程中，迫切 need 加大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升级的力度。从外部增加此类投资的常规路径固然可循，但更应该考虑通过加速折旧的方法，内在地调动企业设备投资和更新改造的积极性。特别是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改造升级的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避免无形损耗可能带来的损失，应允许它们以更大幅度加速折旧。与基于预计可使用年限的平均折旧法（所谓直线折旧法）相比，加速折旧法（递减折旧法）能更快地摊销应折旧金额，使固定资产的价值在使用期内尽快得到补偿，加快设备投资的现金回流，更有利于企业的固定资产更新改造。从经济本质看，加速折旧是一种“税式支出”，较之政府直接支出，它除了对国库不产生直接压力之外，更有激励企业自主投资和自主创新的积极作用。从国际上看，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总是将加速折旧作为走出危机的强力措施来采用，借以提高投资率，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能力。这些经验值得借鉴。

其三，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节能环保产业。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特别是以雾霾为代表的各种环境污染问题频现的新形势下，发展节能环保产业，能为切实解决高耗能、高排放的问题提供治本路径。节能环保产业已被列入国家加快培育和发展的七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之一，2013年8月，国家又发布了加快该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十二五”期间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以上，到2015年行业总产值达到4.5万亿元，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的目标。目前来看，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以及资源循环利用，都是节能环保产业的投资重点。

然而，在现行的商业环境下，更新改造投资得不到足够的刺激，而对社会基础设施和节能环保产业的投资，则难有可持续的商业价值。这都会成为制约投资增长的硬约束。为稳定经济增长，我们必须迅速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更多转向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使企业获得足够的收入以弥补成本并得到合理的回报，从而形成稳定的投资行为。

四 谁来投

在传统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是政府投资的天然领域，原因在于，这些领域突出地存在着自然垄断性、公共性和外部性。然而，随着市场不断发展和实践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对上述领域的全面渗透，这些影响社会资本进入的障碍，或者渐次消失，或者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予以克服。基于这些实践，经济理论对自然垄断性、公共性和外部性有了新的概括，从而为在这些领域进一步改革投融资体制开拓了可行的空间。

首先看自然垄断性。社会资本的进入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实现。一是可采取资本形式进入。自然垄断性不应成为产权独占的依据。即使是具有整合效应的网络基础设施，也可将投资环节与运营环节

分开，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和经营主体一元化并存的格局。二是可采取经营权形式的进入。在某些具有网络特征和自然垄断特性的领域和环节，尽管通过“市场内的竞争”方式实现进入难度较大，但通过政府特许经营、委托经营或承包经营等制度安排，仍可确保社会资本通过“争夺市场的竞争”方式实现有效进入。此外，随着技术创新、市场容量扩大和金融创新的出现，基础设施中某些原来被认为具有自然垄断性的业务或环节，其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被逐渐克服，成为能够引入社会资本的非自然垄断性业务或环节。

其次看公共性。社会资本的进入可以基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公共产品属性的变异。随着需求水平的提升和需求弹性的增大，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排除性量化技术的出现，纯粹公共性正经历着向非纯粹公共性或准公共性的转变。这为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提供产品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二是灵活的制度安排。对于某些商业性不足的准公益性项目，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如土地综合开发利用、公益性环节财政补贴等）改善投资的预期收益，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即使是某些纯粹公共产品以及外部性相当显著的纯公益性项目，也可通过政府采购制度、经营权拍卖、招投标制度以及承包和委托经营等形式，实现（纯粹）经营权方式的社会资本参与。

最后看外部性。社会资本之所以能够进入存在外部性的领域，主要是因为政府的责任事实上是有限的。在社会生活中，某些优效品与服务，由于存在着消费上的正外部性，需要且应该由政府补贴或免费提供。但这种提供责任，主要强调的是政府在消费环节上的支付责任，而不是其在生产环节上的供给责任。特别是教育、健康服务这类准公共产品，完全可以不要求由政府直接生产，甚至可以不要求由政府直接投资。除了那些服务质量可监督程度和可立约程度比较低的领域外，政府应大规模采取服务合同外包或政府采购合同、服务管理合同、特许经营合同等，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在服务供



给中的作用，政府则相应地把自己的责任确立为加强监管。

为了让社会资本发挥更大作用，还应尽快改革投融资体制，着力降低行业进入门槛，逐步向社会资本让渡部分所有权或经营权，进而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实现竞争主体多元化和股权结构多元化。应尽快改变政府主导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投资的局面，更多采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投融资模式，加强政府公共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合作。

为有效动员、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应确保新进入企业和原有垄断企业（在位企业）之间实现公平竞争。应加强《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有效控制市场关闭行为。监管部门应着力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接入政策特别是接入定价问题，二是网络租借或网间互联互通问题，三是普遍服务与交叉补贴问题。特别地，为尽快改变不对等竞争局面，对原有垄断企业和新进入企业可实行不对称监管，管住大的，扶植小的。当真正形成有效竞争局面后，可改为中性的干预政策，以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调节功能。

确保政府承诺的可信性以及政策的稳定性具有同等重要性。由于基础设施的资本密集度高，资产专用性和资本沉淀性强，加上合同的不完备，潜在的投资者往往担心利益被侵占。这就需要创造相对可信的投资政策环境。要保证政府和民间部门所订立的合同内容明晰且切实可行，并保持政府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使民间资本的参与建立在一个可预见的制度框架下；同时，要在法律框架下约束政府未来的行动，保证其对民间部门的承诺得以兑现，使投资者得到应有的回报；当政府不能履行承诺而给投资者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时，也要给予其相应的经济补偿。从而稳定投资预期，正向强化投资激励，动员和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扩展投资。

五 如何投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高储蓄率国家，2013 年底，国内部门总储蓄率超过了 50%。就此而论，中国国内投资的资金约束，并不体现为有无，而是体现在用何种方式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实在说，这是我国金融领域长期存在且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

关于“如何投”，有以下两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一是债务依存度过高。在我国目前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债务性融资占据首位。一般而言，随着传统银行系统以外的金融中介活动快速发展和金融脱媒趋势加速，债务性融资比重将逐步下降，股权性融资相应上升。中国的情况则不然。金融的脱媒并没有如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那样，导致股权融资比重上升，多数情况下，只是改变了间接融资的路径。通过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金融机构表外融资，中国的间接融资依然保持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加之公司信用类债券（包括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公司债券等）发行规模不断上升，中国经济过分依赖负债融资的格局近年来似有恶化之势。资本金或所有者权益在融资结构中的比例过低，加重了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资本结构错配风险，也提高了全社会的债务水平和杠杆率，加剧了风险的积累。我们的测算表明，金融危机以来，全社会杠杆率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各部门（居民、非金融企业、政府与金融机构这四大部门）加总的债务总额占 GDP 的比重从 2008 年的 170% 上升到 2012 年的 215%。其中，企业部门债务总额占比高达 113%，远远超过 OECD 国家的风险阈值。

为分散过度依赖债务融资带来的风险，我们需要认真推动中国金融结构从债务性融资向股权融资格局转变，优化投资的资金来源



结构。为此，应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创造有利于股权资本形成的机制，多渠道增加股权性投资比重。应鼓励将债务性资金转变为股权性资金的金融创新，特别是应推行公用事业项目的证券化进程，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解决长期资金筹集问题。通过提供稳定持续的中长期资金，我国资产负债表中的期限错配问题，方能得到解决。

二是资金成本上升。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资金价格上行的态势凸显。据估计，从2013年6月至今，市场资金成本平均上升了2个百分点左右。在我们看来，这主要是我国金融市场存在严重扭曲所致。

从资金供给侧看，在货币信贷存量较高、社会融资规模较大的情况下，资金成本的上升，反映了部分空转资金在金融部门内部的自我服务和自我循环。最近两年以来，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同业业务增长迅猛。以16家上市银行为例，其同业资产规模由2010年底的5万亿元提升至2012年底的11万亿元；同业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则由2010年的8%上升至2012年的12%，有些股份制银行已经超过25%。同业业务的快速扩张，凸显了我国金融抑制的恶化，以及在此环境下的“创新异化”，体现了监管套利严重存在（金融机构试图避开带有行政色彩的金融监管，包括信贷额度配给制和限制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提供贷款）、资本金约束、贷存比的流动性约束，同时追逐存贷款利率分割管制所创造的息差交易机会。应对以监管套利为主要目的的同业业务的无序扩张，根本手段是进一步放松管制，特别是放松对银行体系的信贷额度控制和贷款投向管制（改用各种监管指标的管理）；应尽快改革已经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分业监管格局，同时，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通过体制内外资金成本的收敛来缩小利率双轨制带来的息差交易空间。

从资金需求侧看，资金成本的上升反映了广泛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作为重要的融资主体，其软预算约束问题严重存在，这是产生道德风险的最大温床。由于这些融资主体对资金价格的敏感性相对较低，对资金需求始终处于饥渴状态，其融资规模的扩大，便会推高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对此，应深入推动地方政府和国企改革，硬化它们的预算约束，减少它们对资金的无效占用。

同时，还有一类道德风险，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金需求侧问题，但也与此密切相关。这就是“刚性兑付”的存在，助长了无风险的市场套利行为，加剧了投资者的道德风险。目前来看，一些金融产品（如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往往缺乏基本的风险意识，认为这些产品不存在违约风险，或者认为，即使存在违约风险，也会有银行或政府的隐性担保作为安全保障。事实上，虽然从法律角度说，大部分理财产品是非保本的，损失应由投资者承担。但考虑到银行自身声誉，理财产品一旦出现投资失败，导致产品违约，最终还是由银行承担还款责任。至于地方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往往采取干预措施阻止投资产品违约。这种隐性担保的存在，使得高利率金融产品被视为“无风险”溢价的产品。投资者对低风险、高收益金融产品的特殊偏好，是推动全社会利率水平不断走高的需求面因素。为摆脱这一困局，首先应打破“刚性兑付”，允许违约事件发生，特别是应减少中央政府信用背书下的道德风险发生。当然，通过推进改革，强化市场自身的自律机制，使风险与回报相匹配，具有更根本的意义。

目 录



前言	经济增速趋降 应对还须改革	李 扬 / 001
Ⅱ.1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2014 年春季报告	课题组 / 001
Ⅱ.2	2014 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不变	刘树成 / 029
Ⅱ.3	重视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 问题	汪同三 / 038
Ⅱ.4	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及走势的分析与 预测	孔宪丽 高铁梅 张同斌 / 050
Ⅱ.5	2014 年农业发展的评价与思考	李 周 / 072
Ⅱ.6	工业经济形势及趋势分析	金 碚 原 磊 / 090
Ⅱ.7	现阶段我国产能过剩的特征、发展趋势与政策 建议	李 平 江飞涛 李晓萍 / 112
Ⅱ.8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基本路线分析	高培勇 / 130
Ⅱ.9	2014 年中国金融状况分析与展望	陈守东 易晓澍 / 154
Ⅱ.10	汇率改革以来中国外贸数据分析	裴长洪 沈 嘉 / 172